

2022年10月,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在南海开展工作时,于海南岛与西沙群岛之间、距离三亚市东南方向大约150千米处的海底发现两处古代沉船遗址。2023年10月,国家文物局发布了这一世界级重大考古发现,将上述两处沉船定名为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并入选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联合组队,采用一系列先进技术和装备,实施了三个阶段的水下考古调查,提取了928件(套)出水文物。2024年国庆节前,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推出“深蓝宝藏——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考古成果特展”(以下简称“深蓝宝藏”展),满足公众对深海考古和出水文物的期待。2024年9月27日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联播》《焦点访谈》《共同关注》《第一时间》等主流媒体多次报道该展,推出双语纪录片《深海遇见丝路》,全国各大媒体平台争相收录和转播,社会反响强烈,关注度高。

考古文物是博物馆展陈的重要基础,博物馆则是考古成果走向公众最重要的平台。不同于以往考古项目转化为博物馆陈列展览时间长、转化效率低、展陈手段不佳等问题,此次“深蓝宝藏”展在第三阶段考古发掘完成后不到半年时间便开展,转化效果显著,其关键在于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中科院深海科学与 Engineering 研究所、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三方建立了相对完善的协同机制,采用“边考古、边保护、边展览”的动态模式,资源整合与共享程度高,共同打造了一场深海出水文物的盛宴,更是一次关于中国科技实力和考古事业迈向深蓝的盛大宣言。

深海考古全过程展示

水下考古作为考古学的一部分,是田野考古学向水域的延伸,而位于水下千米级非常规环境下的深海考古,不仅需要面对复杂的海洋地质、水文、气候环境,更需要多领域、跨学科协作,兼具挑战性、危险性与神秘感。“深蓝宝藏”展览的叙事线不仅仅展示出水文物,而是以四分之一篇幅完整呈现一个现代重大考古项目的全过程,我国在深海领域技术实力的进步,为考古学家开拓了“最后一片疆域”。

“深蓝宝藏”展览的第一部分“探渊寻踪”从南海西北陆坡地质环境、考古调查方案制定,到以“探索一号”“探索二号”科考船作为工作母船,通过多波束、高分辨率声呐系统和水下声学定位系统进行探测,再到利用“深海勇士”号载人潜水器进行探摸、操纵柔性机械手,实现灵活、安全提取文物……,系统性地展示了深海考古的运作过程。

展厅配备VR设备与沉浸式体验装置,跟随“深海勇士”号一起下潜,通过三维动画、数据可视化等方式,操纵机械手从海底提取文物,激发观众特别是青少年,对考古学与海洋科学的兴趣,使得“深蓝宝藏”展不仅是一个文物展,更是一个“科技成就展”和“考古方法展”。

出水文物的全方位阐释

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考古发现的极端重要性和文物价值的空前性在展览第二部分“水府琳琅”得到全方位阐释。三个阶段的下水考古出水文物928件(套),展览选取具有典型意义的408件(套)重点展示,按照器物类型学研究方法,对器型、纹饰、工艺、窑口,甚至胎质、釉色及釉面等进行分类整理和展出,确定南海西北陆坡一、二号沉船遗存的性质,聚焦明代中期海上丝绸之路贸易往来。

南海西北陆坡一号沉船遗址出水瓷器占据相当大的比重,涵盖青花瓷器,青釉、白釉等单色釉瓷器,红绿彩、素三彩等低温釉瓷器,以及珐华器稀有名贵品种,窑口以景德镇窑为主,部分龙泉窑产品,器型几乎涵盖了明代中期所有类型。其中,青花瓷器数量最多,以器物主体纹饰和器型类别分组展示。红绿彩瓷器色彩丰富鲜艳,其中,“丙寅年造”款红绿彩婴戏纹碗,为一号沉船的年代确认提供了佐证,为彰显其重要性,展览特别设计了极具通透感的磨砂亚克力圆柱形积木托台,安装反光镜,让底部的款识一目了然。

一号沉船出水的珐华彩瓷器是此次展览最受瞩目的明星展品。明代景德镇窑烧制的珐华器在元代山西珐华器基础上有所创新,胎釉精细,色彩明艳,堆塑、镂空、贴花、贴金等装饰手法多样,立体效果明显,纹饰题材丰富,推测属于海外高端订制瓷。在出水珐华器的基础上,展览还借展了山西博物院、湖南博物院以及景德镇御窑博物院的出土和传世展品进行对比展示,使得珐华器的时代特征愈加鲜明,外销的性质愈发彰显。

这种对比展示的方法也应用在青花窑年代确认和贸易网络区域上。一号沉船遗址出水大量景德镇窑口生产的青花瓷器,与吉林省松原市扶余明墓和江西景德镇落马桥遗址出土文物高度近似,这些发现表明,至迟在明代,景德镇窑业生产的市场辐射范围已经覆盖自东北至南海的广袤区域,为探讨明代贸易网络、区域交流等问题提供了新的研究方向。南海出水文物以浅蓝色托台、出土文物以灰色积木托台加以区别,通过对比研究,推测一号沉船年代在明正德时期(1506—1521),说服力强。

南海西北陆坡二号沉船以排列紧密、码放整齐的大量乌木为主要载货,经过三个阶段的考古调查,成功提取了38件文物,种类涵盖乌木、陶瓷器、蝶螺壳和鹿角等,推测二号沉船时代为明弘治时期(1488—1505)。

明代,乌木作为朝贡贸易的重要物品,由古城、暹罗、真腊、爪哇等地向明廷进贡。明朝后期,乌木家具及其他器具受到达官显贵的追捧,从床榻、橱柜、茶几等家具,到印章、扇骨、镇纸、筷箸、工艺雕刻等小件器物,乌木制品涵盖了日常生活的多个领域,同时也刺激了海外走私贸易的发展。展览借展了故宫博物院的乌木卷书式扶手椅等9件文物、充分说明乌木在上流社会中的使用之广泛性。展览展示了安东尼奥·德·佩雷兹创作于1652年的《乌木盒子静物画》,以马德里贵族下午茶的场景为背景,描绘了伊斯兰地区所产陶器、东方景德镇所产瓷器和产自热带地区的乌木等物品,这些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物品汇聚于此,成为17世纪全球贸易的生动缩影。

通过对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遗址出水文物的全面阐释,表明沉没于明代弘治—正德年间的两艘沉船货物的巨大差异性,再现了大航海时代双向贸易的完整链条,为中国航海史、海洋贸易史和中外文化交流等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基于文物保护的开放实验室

在“深蓝宝藏”展的第三部分“巧缮焕新”,两座巨大的玻璃脱盐池被直接搬进展厅,脱盐池中是刚出水不久的文物,观众可以亲眼看到这些深海出水文物清洗、脱盐、加固和修复过程。

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遗址出水的文物,材质、器型多样,由于长期受到海水侵蚀和海洋生物附着,深海高浓度盐分使得陶瓷空隙里满是氯离子,出水后由于温度和湿度的急剧变化,会反复结晶和溶解,因此刚出水的海洋文物,如果不经恰当处理,很快就会“生病”,甚至酥解,给文物保护工作带来了极大的挑战。为了尽可能地保存这些珍贵的深海文化遗产,考古工作者在发掘现场和实验室两个阶段,需采取一系列科学有效的保护措施。如出水文物在提取过程中,就已经通过扫描电镜、X射线荧光分析仪等设备,实现了对深海文物材质的快速检测与初步保护。其中,408件出水文物在2024年展览开幕亮相时,已采用真空包装、充氮保护等技术进行初步修复,这些技术的应用不仅提升了深海考古的效率与精度,也为后续文物保护提供了科学依据。

在“深蓝宝藏”展中,出水文物保护和修复不是实验室中的“隐蔽工程”,而是工匠精神在文物保护中的精彩呈现,既展示文物之美,更要展示文物保护的科技之美,“巧缮焕新”为水下文物保护打开了博物馆展示的窗口。

“深蓝宝藏”展的实践,不仅是一次考古成果的简单陈列,更是一次跨学科融合的创新型文化实践,它成功地将深海科技、水下考古、文物保护、历史叙事与公众教育紧密结合,为观众呈现了一场既有学术深度又有视觉冲击力的文化盛宴。展览在最短的时间里将“冷门”考古成果转化为博物馆的“热门”文化产品,推动文物资源活化利用,提升文物的社会影响力。目前,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遗址第四阶段的考古调查发掘工作正在继续,展览采取动态更新的形式,根据深海考古新成果和研究成果,不定期更新内容与上展文物,使展览始终保持新鲜感和吸引力,让观众有“常来常新”之感。同时,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二期工程正在紧张施工中,更多的水下考古发现将在新的博物馆中得到充分展示,担当起转化、展示、传播重要考古成果的时代重任。

(作者单位:国家文物进出境审核海南管理处)



南海西北陆坡一号沉船出水珐华镂空贴金孔雀牡丹纹大罐



南海西北陆坡一号沉船出水青花八仙图案大罐



《乌木盒子静物画》

国际博物馆协会最新修订的博物馆定义中将“教育”调整到博物馆业务目的首位,反映了国际博物馆界近年来对博物馆社会责任的重视。在文化遗产传承与公众文化认同构建的双重诉求下,博物馆作为社会记忆的核心载体,其与教育体系的深度融合成为关键议题。近年来山东博物馆与学校开展的系统性馆校合作,为公众博物馆记忆的培育提供了典型样本,以期从理论与实践层面剖析其内在逻辑。山东博物馆立足文博专业视角,通过实践揭示馆校合作在公众记忆建构中的独特作用,突破传统博物馆教育的单向传播模式,为博物馆社会功能的拓展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参照。

博物馆记忆与馆校合作的学理基础

社会记忆的建构性本质是基于哈布瓦赫集体记忆理论,解析博物馆通过文物叙事、空间体验与教育活动对公众记忆的塑造机制。博物馆的记忆中介角色是从“藏品保存者”到“记忆建构者”的范式转型,强调其在历史与现实、个体与集体记忆间的桥梁作用。以“明体达用,体用贯通”为指导,构建博物馆资源与学校教育体系的有机衔接模式。而博物馆教育作为非正式学习理论的应用价值在于分析馆校合作如何通过沉浸式、体验式学习增强公众对博物馆记忆的深度认知与情感联结。

山东博物馆馆校合作的实践探索

(一)针对中小学校,以任务为导向,构建合作平台

1.搭建博物馆青少年教育教研平台

山东博物馆每年有50万人次以上青少年参观。为了让青少年由“逛博物馆”转变为“读博物馆”,更深刻地感受中国传统文化之美,山东博物馆联合省内各区分小学校,在博物馆教师沙龙的基础上,搭建博物馆青少年教育教研平台。定期举办活动,学校老师与博物馆专业人员深入学习交流、资源共享,馆校共同打造博物馆青少年课程。近年来,针对不同年龄段,开发涉及自然标本、历史文物等展品涵盖中小学语文、历史、地理、生物、科学等学科的综合性博物馆课程20余项。根据博物馆青少年群体的参观实际,先后拟定了山东博物馆青少年观众校园教育计划和家庭教育计划,构建馆校合作下的“家庭—博物馆—学校”教育共同体。

2.搭建博物馆青少年教育展示平台

以任务为驱动,以展示为形式,以探究为手段,搭建博物馆青少年教育展示平台。例如,山东博物馆举办的环球自然日活动,每年选定一个主题,在老师的指导下,由学生组成团队,以展览或表演的形式,在山东博物馆进行展示。环球自然日活动每年有400支左右的队伍到山东博物馆参加展示,带动100余所学校关注本活动,带来的间接社会效益不可低估。此外,山东博物馆还联合学校举办青少年作品展览、国学经典诵读、传统文化体验等活动,充分发挥博物馆的教育和展示功能。

3.搭建博物馆青少年教育传播平台

2014年、2015年,国家文物局委托北京、山东、浙江等十余个省市连续开展了两轮完善博物馆青少年教育功能试点工作,2016年又继续开展博物馆青少年教育功能提升项目,2015年7月国家文物局和教育部联合印发文件推动文教结合,探索构建具有均等性、广覆盖的青少年利用博物馆学习的机制。山东博物馆作为连续三年的试点单位,努力构筑具有示范性、传播性、可复制性的博物馆青少年教育机制,“让孩子在博物馆里长大”,“让孩子成为博物馆的小使者”。与学校合作举办“博物馆代言人活动”,选拔优秀的学生担当博物馆的文物代言人,培育一颗博物馆文化传播的种子,让一个孩子带动一个班级,一个班级带动一个学校,一个学校带动一个社区,形成博物馆青少年教育教研、展示、传播的良性互动。

(二)针对大专院校,构建大学生志愿服务平台

1.高校协同育人机制的创新构建

山东博物馆与近20所驻鲁高校签约形成的“资源共享—项目共研—人才共育”的长效机制,双向赋能师资与人才培养“双导师制”“馆校互聘”模式,研究如何促进学术资源与实践经验的双向流动。山东博物馆研究员参与高校课程设计,高校教师主导博物馆研学项目开发,培养兼具理论素养与实操能力的文博人才。同时,与山东大学共建考古发掘实践基地、与莱芜职业学院共建文物保护技术实验室等。

2.大学生志愿服务平台的传统延续

大学生志愿者作为博物馆志愿者团队的重要力量已经成为高等院校素质教育社会化的重要标志。近年来,大学生参加博物馆志愿者的积极性越来越高,仅靠博物馆的一己之力无法满足广大学生的意愿。山东博物馆积极与高校合作将博物馆大学生志愿服务平台作为一粒点亮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火种,照亮大学校园,温暖整个社会。在高校内,山东博物馆与高校团委合作成立山东博物馆大学生志愿者高校分队,作为高校社团在校内进行招募培训,开展博物馆文化传播等活动,山东博物馆定期对其进行博物馆知识培训和考核,考核合格者进入山东博物馆开展社会服务。在馆内,根据大学生志愿者的专业背景和兴趣爱好分为公众服务、展览讲解、活动策划、宣传推广等服务小组进行专业对口服务。山东博物馆已与18所高校成立了大学生志愿者分队,他们周末服务在山东博物馆的各个志愿岗位上,平时在学校内开展相关的博物馆文化学习和传播活动。

3.资源整合与记忆传播的技术赋能

数字化记忆库的共建共享探讨馆校合作过程中数字人文技术的应用,与中国海洋大学、国家文物局水下考古研究中心共建海洋文物数据库、开发3D文物模型虚拟修复系统,通过数字化手段实现文物资源的跨时空传播与记忆存储。同时关注新媒体的记忆叙事创新,以博物馆官方公众号、短视频账号为载体,利用高校志愿团队参与策划“文物冷知识”“镇馆之宝背后的故事”等系列内容,借助社交媒体的裂变传播特性,扩大博物馆记忆的公众触达范围。

完善公众博物馆记忆的生成机制与影响评估

(一)记忆建构的三重维度分析

1.认知维度:通过馆校合作课程的知识传递,提升公众对文物历史背景、文化内涵的准确理解,山东博物馆对馆校合作进行了为期三年的专题调研,调研结果显示,参与过“齐鲁文明探源”“知书达理”课程的学生对山东历史文化的认知度提升了40%。

2.情感维度:通过教育互动体验活动的不断迭代升级,研究如何激发公众的文化认同感与情感共鸣。山东博物馆连续五年进行的“带着家乡文物上大学”活动,通过高中生这一特殊群体从认识文物,到研究某件文物,到制作公众知识“镇馆之宝背后的故事”等系列内容,借助社交媒体的裂变传播特性,扩大博物馆记忆的公众触达范围。

3.行为维度:分析馆校合作对公众博物馆参与行为的影响。如学生参与志愿讲解、参与文物保护实践宣传等项目中的

多维协同与记忆构建

——山东博物馆馆校合作的实践路径与公众参与研究

张德群



山东博物馆“礼出东方”系列课程



山东博物馆“我们的节日”系列课程

反馈,形成“认知—情感—行动”的记忆强化闭环。

(二)记忆传播的效果评估体系

1.确定定量评估指标:包括参与人数、课程满意度、社交媒体传播数据等。山东博物馆经过近十年的深耕,形成了馆校合作项目年均覆盖学生及公众超10万人次,线上内容点击量破百万的庞大数据库。在这个数据的基础上,分析定量评估指标,为后期的项目提升和馆校合作机制的形成以及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2.定性评估方法:通过深度访谈,挖掘公众对博物馆记忆的主观建构过程。山东博物馆制定了观众评估十年规划,不断提升评估质量,其中青少年对馆校合作项目的体验感评估一直得以延续并不断提升。例如针对青少年群体普遍反馈“在修复文物时感受到了历史的温度”这一现象进行了跟踪访谈调研,从而催生出了“带着家乡文物上大学”这一馆校共建项目,体现馆校合作对具身记忆的塑造作用。

挑战与对策:馆校合作深化公众记忆建构的优化路径

(一)现存问题剖析

1.合作深度不足:目前很多学校对博物馆仅仅停留在参观、实习层面,缺乏对文物内涵的深度挖掘与跨学科整合。同时,学校教师是以学科门类划分的,专业性强,而博物馆的教育具有综合性和交叉性,博物馆教育人员很难与教师进行系统的研讨和培训。未来可以将博物馆培训纳入教师继续教育培训积分,切实保障教师与博物馆教育人员的权益。

2.长效机制待完善:馆校合作很多情况下存在阶段性特征,缺乏对公众记忆持续影响效果的跟踪评估,而要达到这一目的最主要的还是要建立长效机制。在工作实践中,我们往往能够感受到馆校合作经常出现虎头蛇尾的现象,刚开始轰轰烈烈,到最后无疾而终。这里面既有具体操作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机制问题。我们的理想预期应该是以班级为单位,安排学生,运用博物馆开放性的学习空间,进行博物馆教育,使学生能够调动多感官和思维,主动接收各种有效信息,最终取得高质量的学习效果。而大多数学校则以年级为单位,或者以学校为单位,一次组织百余人甚至上千人参观博物馆,导致教育效果大打折扣。

(二)可持续发展策略

1.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保证文物可利用度最大化

我国公立博物馆与国外博物馆及私人博物馆不同,其收藏的所有文物所有权都属于国家,在很多文物的处理和利用上,博物馆都会采取比较谨慎的态度,甚至相应权限比较小。针对目前国内博物馆与学校合作过程中文物使用尺度问题,建议组织文物专家进行相关研究论证,出台相应政策法规,明确哪些文物、何种状态的文物可以用于社会教育、哪些文物可以进行复制、拓片等用于社会教育,文物在社教活动中应该如何使用,以及相应的使用尺度等,形成一套完善的法律法规及安全保障体系,在可行范围内保证文物的社会教育效果最大化。

2.博物馆发挥主观能动性,提高专业人才参与度,确保文物资源利用效果最大化

现行博物馆开展社会教育活动多为宣传教育讲解部门负责,存在对文物了解不深,缺少对馆内可利用文物资源的全面把握。建议博物馆的社会教育设计过程中,尤其是馆校合作、文物进校园等方面,要安排文物研究方面的专业人士参与,以便对本馆文物的数据、特性、现状等进行充分了解与把握,在此基础上给出合理建议,挑选出与学校课程内容联系紧密、可让孩子上手接触、可复制或拓片用于教学的等多方面要求的文物或标本,确保对文物资源利用效果最大化。

3.加强博物馆与学校学科体系间的沟通,打通馆校壁垒,实现文物社教同学校教学无缝衔接与融合

我国学校的学科教育是相对完整成形的体系,现在的馆校合作多作为课外补充或实践活动,与课堂内容衔接不够紧密、及时,不具有长期性,难以达到理想的课外教学效果。建议博物馆社教相关人员应与学校学科体系建设相关专家学者进行沟通,针对学校课程内容与可利用文物资源之间如何紧密结合并长期应用,开展相关论证研究。根据学校教学内容选择可利用文物资源并设置相关课程,同时可根据文物资源对学校课程进行适当调整,不再是仅将文物课程作为课外单独的课程、作为仅一两次社会实践方式,而是让文物真正与学校课程相融合,走进课堂,成为学校系统教学的一部分,并形成长期、系统性的课程,真正实现文物与学校教学深度融合。

结语

博物馆的概念在潜移默化中发生着变化,从以“物”为主体,到以“人”为主体的变化,是博物馆概念和内涵的最大变化,博物馆社会教育应由“以物为本”向“以人为本”转变,由“单向传播”向“双向互动”转变,由“经验管理”向“理论研究”转变。展望数字化时代,博物馆可以不断加强元宇宙技术在记忆体系中的应用,如建立虚拟文物修复工坊、探索“馆校社”三方协同模式,使博物馆记忆成为连接历史、当下与未来的文化纽带,最终实现从“机构记忆”到“公众记忆”的深度转化。

(作者单位:山东博物馆)